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
學士班學生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achelor Degree Thesis



去政治化的公民參與？

東亞四國社團參與及政治參與的比較

Depoliticized Civic Participation:

A Comparison of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ast Asia

陳廷彥

Ting-Yen Chen

指導教授：林國明 教授

Professor Kuo-Ming Lin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April 2019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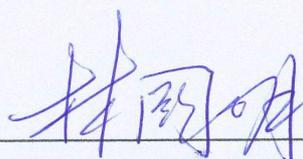
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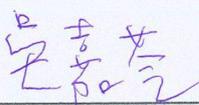
去政治化的公民參與？東亞四國社團參與及政治參與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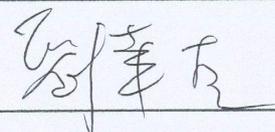
Depoliticized Civic Participation: A Comparison of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ast
Asia

本論文係陳廷彥君（學號：B05305008）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完成之學士班學生論文，於民國 108 年 4 月 26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3 位）：


_____ (簽名)
(指導教授)





系主任： _____ (簽名)
(是否須簽章依各院系規定)

誌謝

這篇文章的寫作靈感，最早是受益於106年度第一學期吳嘉苓老師「社會研究方法甲上」課程的團體報告。我要感謝嘉苓老師當時讓社會系的同學有機會接觸東亞社會調查的資料，也要感謝當時同組的康寧、李芯、歐佩宣、謝明展、鄭芷穎、蔡喬安、張雅涵、羅鈞瀚幾位同學在該團體報告中的討論與協助，許多當時的想法提供了本文重要的養分，讓我得以在其基礎上重新發想研究問題、統計模型與理論解釋。後來投稿學士班論文獎，則要感謝林國明老師願意擔任指導老師，以及林國明、吳嘉苓、劉華真三位老師擔任口試委員並提供我寶貴的修改建議。最後，我也得要感謝傅斯年獎評審委員給予本文校長獎的肯定。

中文摘要

傳統「社會資本論」強調社團參與及政治參與的正向關聯，然而在日本與南韓，高度的社團參與卻未反映在政治參與率上。本文利用「2012年東亞社會調查」的資料，分析中國、日本、南韓、台灣四國在社團參與的深度、廣度、類型、階層化程度、同質化程度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政治參與的影響。本文發現，日本、南韓的社團成員普遍參與政治意涵較低的社團，反映了「去政治化」的社團參與傾向，因此導致了社團參與及政治參與的落差；中國與台灣則呈現「去政治化」的公民社會社團組成，缺乏本身就有高度政治性的社團類型。這種「公民社會形構論」的觀點，有助我們理解在培養個人心性之外，各國的歷史脈絡如何影響社團類型對政治參與的效果，從而能深化我們對社團參與效應跨國差異的理解。

關鍵字：社團參與、政治參與、東亞、公民社會形構論、社會資本

英文摘要

Traditional “social capital theory” emphasiz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group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yet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e high proportion of civil group participation does not lead to hig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ate. This article uses the data from the 2012 East Asia Social Survey to answer the puzzle. By analyzing citizens’ tendency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groups in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nd its effect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 find that organization members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 tend to participate in associations with lower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engagement, reflecting the “depoliticized” tendency of civic participation, which then explains the gap between civic group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is view of “civil society configuration” helps us to understand how historical contexts, rather than mere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fluence the effect of civil group participation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it can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membership in different countries.

Keywords: civic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ast Asia,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configuration, social capital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 前言	1
第二章 理論回顧	2
第三章 資料與方法	5
第四章 結果與分析	7
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14
參考文獻	16



表目錄

表一	東亞四國社團參與與政治參與的概況.....	1
表二	理論、指標與假設.....	3
表三	東亞四國社團參與與政治參與的邏輯迴歸.....	7
表四	東亞四國有參與社團者的積極程度.....	9
表五	東亞四國有參與社團者的參與廣度.....	9
表六	東亞四國人民的社團參與類型.....	10
表七	東亞四國社團階層化程度與同質化程度.....	11
表八	東亞四國社團參與與政治參與的邏輯迴歸（加入公民心性與能力）.....	11



第一章 前言

社團參與對於政治參與的積極作用，一直是政治社會學的重要討論主題。早在托克維爾的時代，他在《民主在美國》與《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就已強調公民社會對政治參與的重要性，因為次級群體作為一種「民主的學校」，可以培養公共生活所需的公民德性與技能，進而確保個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政治自由。

到了二十世紀，Verba & Almond (1963/1989) 也認為，個人透過參加志願社團，能夠有效將自己與政治體系連結，因為個人所屬的社團能夠在政府面前代表他自身的立場和需求，使政府在進行有損個人利益的決策時更加謹慎。最近二十年來，在Putnam所倡導的「社會資本論」影響之下，關於社團參與對政治參與的促進作用，研究更是蔚為風潮。

上述理論與研究主要來自歐美國家的經驗，但在差異的歷史脈絡與文化背景之下，社團參與對政治參與的關聯也可能呈現不同的樣貌。事實上，已有中美洲與全球多國的經驗研究開始指出，社團參與對政治參與的效果並不總是存在 (Seligson, 1999; Norris, 2002)。

在東亞，特別是日、韓兩國，過去也有許多學者指出不同於社會資本論的公民參與圖像。Pekkanen (2006) 就指出，日本存在著「參加社團但不倡議」(member without advocates) 的「雙重公民社會」現象：一方面，日本有許多社團、日本人民也高度參與在結社活動中，但另一方面，這些社團卻低度參與影響政治決策的活動。Park & Shin (2005) 也指出南韓雖有不少人民參與社團，但他們多半參與非正式的私人社團，而非傳統上被認為更能激起政治參與的正式社團。換言之，參與社團組織的社會資本，在東亞的脈絡中，不見得能夠轉換成影響政策的公民行動。

2012年東亞社會調查 (East Asia Social Survey) 結合日本、南韓、台灣、中國的資料，進一步提供了在東亞脈絡中，透過四國比較檢證此一主題的機會。熊瑞梅 (2014) 利用這份資料指出，日本和南韓在公民組織的發展相對成功，至少參與一個社團的比例都超過75%，但臺灣公民組織的發展顯得相當脆弱；然而，這份資料也顯示，日、韓的政治參與率仍都低於10% (如表一)，比起台灣、中國並未高出太多。這個現象同樣顯示前述「社會資本論」的適用性有所侷限：社團參與率有極其明顯差距的不同國家，在人民的政治參與上不見得有同樣明顯的差距。

表一 東亞四國社團參與與政治參與的概況

	中國	日本	南韓	台灣
至少參與一社團的比例	23.41%	80.90%	76.07%	36.60%
政治活動參與比例	1.44%	6.01%	5.44%	4.14%

本文的目標，即是要解釋為什麼社團參與率高的日、韓兩國，政治參與率卻仍然低落？藉由這樣的跨國比較，應可讓我們更加理解社團參與在今日民主社會的重要性。

第二章 理論回顧

要解釋社團參與及政治參與之間的落差，就必須檢視兩者之間的因果機制在這幾國的狀況。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我歸納出四個主要的因果機制：社會化機制論、動員論、公民社會形構論及東亞價值論。前三種機制主要是參考林國明（2016a, 2016b）的歸納，而最後一種則是參考Ikeda & Takemoto（2016）的研究。以下將逐一說明。

（一）社會化機制論

Putnam（1993）等人的「新托克維爾主義」觀點主張，積極參與社團活動，能讓公民在頻繁的面對面互動中，學習到能用在公共事務的公民技能與政治知識（資源），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與效能感（動機），因而促進了政治參與。在這種觀點下，積極參與社團的人，比起消極參與者會涉入更多政治活動。

如果用「社會化機制論」來解釋為何日、韓的社團參與「轉換」成政治參與的比率較低，其解釋便可能是：這兩國人民儘管整體參與社團的比例高，但這些社團參與者的積極性普遍低落，因此只有少數人能在社團參與中經歷到「社會化機制」的效果。

（二）動員論

網絡動員論主張，社團參與之所以能促成政治參與，主要是因為公民透過社團建立起的人際連帶，接觸到政治行動的管道與資訊。在這種觀點下，參與社團數量、類型愈多，所接受到的資訊愈多，政治參與的程度也會愈高。

如果用「動員論」來解釋本文的核心問題，其解釋可能是：日、韓兩國人民雖然參與一個社團的比例高，但參與社團廣度整體而言低，因此多數人並未體驗到「動員論」的效果。

（三）公民社會形構論

除了社團參與的廣度與深度，社團的類型也是影響政治參與的重要因素。舉例來說，Sobieraj & White（2004）就指出，參與沒有政治立場與要推動的議程、非正式互動中也缺乏政治討論的社團，對於政治參與沒有效果。因此，具有「政治內涵」的社團，比起完全「去政治化」的社團，更有可能促成政治參與。

既然社團有不同類型，那麼在不同的社會中，就可能產生不同的「公民社會形構」。此處的「公民社會形構」，我認為可能包含以下幾個內涵：首先，是該公民社會中是否存在著夠多的政治性社團；其次，如果確實存在一些政治性社團，是哪些類型的社團在發揮政治功能*；最後，不同類型的社團的參與人口分佈也很重要，因為即使存在一些政治性社團，如果多數人參與的都是非政治性社團，社團參與對政治參與的效果可能也有限。前面兩點可暫時稱為「公民社會社團組成」，最後一點則可稱為「人民參與社團傾向」。

* 是哪些類型的社團具有「政治內涵」，在每個社會可能是不同的。舉例來說，Jones-Correa & Leal（2001）發現對美國西班牙裔人而言，宗教團體具有公民團體的性質，因此對於政治參與有正向效果；但在其他社會中，宗教團體也常被當成是缺乏政治性的團體（如林國明，2016a）。

如果用這種「公民社會形構論」來解釋本文的核心問題，那麼就表示日本、南韓在「公民社會社團組成」與「人民參與社團傾向」對應關係上的性質，折損了社團參與的效果。在此至少有兩種可能的假設：日、韓的「社團組成」中存在高政治性的社團，但兩國人民傾向參與低政治性的社團，因此抵銷了高社團參與率對政治參與的可能效果；或者日、韓的「社團組成」根本就缺乏政治性高的社團，因此參與什麼社團都沒有太大幫助。

(四) 東亞價值論

是否存在統一的「東亞價值」是個具有一定爭議性的議題：不但有文化化約論的傾向，且不免讓人聯想到新加坡獨裁者李光耀據以駁斥民主人權的「亞洲價值論」。但是，即使東亞各國確實可觀測到普遍的文化價值存在，也不意味著在規範上支持反民主的政權；因此，經驗上這些文化價值對於民主及政治參與的影響，仍然值得實證研究更細緻地檢證。

Ikeda, Kobayashi & Nathan利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的資料，發現在眾多文化價值中，只有兩個價值可以持續從亞洲各國萃取出來——「家父長主義」(paternalism)和「社會和諧」(harmony)(引自湯晏甄，2015: 註12)。

這兩個價值，後來在Ikeda & Takemoto (2016)的研究裡，就被當作是「東亞價值」的指標。且由於人傾向選擇符合自身價值的組織，他們認為東亞價值會體現於社會網絡與社團參與的特徵中：家父長主義的文化價值，會反映在高度階層化的社會網絡或社會團體；社會和諧的價值，則會體現在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社會網絡或社會團體。

從傳統社會資本論來看(Putnam, 2000)，水平、異質的社團參與，將更有助於民主發展與政治參與，體現「東亞價值」的社團則應該有反面效果。不過，Ikeda (2005)早期對日本的研究則指出，雖然參與開放性(與外人有所接觸，類似異質性)較高的社團確實有助於政治參與，他也發現參與高度階層化的社團，反而更能促進政治參與。

因此，若用「東亞價值論」來解釋本文核心問題，解釋可能有兩種：若階層化程度/同質性不利政治參與，那麼可能是日、韓社團階層化程度/同質性高，而抵銷社團參與的效果；若階層化程度/同質性有利政治參與，那麼可能是日、韓社團階層化程度/同質性低。

(五) 小結

整合上述理論，可歸納檢證四理論的基本指標與針對日、韓兩國社團參與狀況的假設，如表二。社會化機制論、動員論與東亞價值論要得到驗證，都有兩個階段：首先，理論機制本身要得到驗證，若無則顯示該理論的解釋不成功；其次，在描述統計上，日、韓的社團參與情形，在該理論的重要參與面向(參與深度、廣度、階層化程度、同質程度)上，正好傾向不利政治參與的一方。公民社會形構論有兩種可能成立的條件，如本節第三小段所述。

表二 理論、指標與假設

理論	指標	理論成立的條件與假設(針對日、韓)
社會化機制論	1.積極參與社團對政治參與的影響	正向顯著
	2.社團參與積極度	低

理論	指標	理論成立的條件與假設（針對日、韓）	
動員論	1.參與類型數對政治參與的影響	正向顯著	
	2. 社團參與類型數	低	
公民社會形構論	1.部分團體類型對政治參與有正向影響	是	否
	2.人民傾向參與政治性團體	否	是
東亞價值論	1-1.階層化程度對政治參與的影響	負向顯著	正向顯著
	1-2.社團階層化程度	高	低
	2-1.同質化程度對政治參與的影響	負向顯著	正向顯著
	2-2.社團同質化程度	高	低

但是，上述歸納聚焦在參與社團的客觀特性，還沒有呈現社團參與到政治參與之間，「社會化機制論」所強調的，可由參與結社培養出的政治參與動機與能力——這種社團參與在個人層面的效果被林國明（2016b）稱為「公民心性與能力」。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也將探討在東亞四國中，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應。

不過，林國明的研究指出，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培養不一定來自社團參與積極度，社團參與廣度也可能帶來同樣效果。因此，本文不侷限「公民心性與能力」為「社團參與深度」的中介變項，而將其視為各理論機制皆可能包含的因素。

第三章 資料與方法

本文資料來源採用2012年東亞社會調查 (East Asia Social Survey)。這份調查從2006年開始執行，每兩年實施一次，是由中國、日本、韓國及台灣的四個調查計畫共同組成的一項跨國問卷調查：中國人民大學主持的「中國社會調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日本大阪商業大學及東京大學主持的「日本社會調查」 (Japa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s)、韓國成均館大學主持的「韓國社會調查」 (Korean General Social Survey)，及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主持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2012年調查的主題是「社會資本」，問題包含社團參與情形、人際網絡、公共事務參與、對他人的信任等。該年調查的總樣本數是11704，其中中國、日本、南韓、台灣各有5819、2335、1396及2134名受訪者。以下說明本文所使用的變項。

(一) 依變項

本文的主要依變項是「政治活動」，該變項所用的問卷題目是：「請問您在過去一年內有沒有參加過下列活動？」中的「政治議題有關的活動 (例如：簽署連署書、參與遊行或抗爭活動等)」。三個答項分別是「有」、「沒有」、「不知道／拒答」。選擇「有」的人占3.30%；「沒有」的人占96.29%；「不知道／拒答」的人占0.40%，本文的分析排除這部分的資料。本文即將有參與者編碼為「1」，未參與者編碼為「0」。

必須指出的是，這裡所採用的「政治活動」，並未涵蓋所有的政治參與形式，而主要是指非投票、但又直接針對政治人物與官員施加壓力的政治參與。投票是正式、體制化的政治參與，其在性質上與較仰賴人際互動、較不體制化的公民行動 (activism) 有所不同

(Sobel, 1993; Ekman & Amnå, 2012)；本文的關注重點是在後者，因為選舉投票固然重要，但在選舉期以外持續給予政府壓力，才更能達到民主體制「有效參與」的理想。

(二) 自變項與中介變項

根據理論回顧的指引，本文主要有以下幾類自變項：參與團體的深度 (社會化機制論)、參與團體的廣度 (動員論)、最常參與團體的類型 (公民社會形構論)、團體內階層化情形 (東亞價值論)、團體內同質性程度 (東亞價值論)。此外，個人層面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培養可能是社團參與促成政治參與的重要因素，故本文也加入四個相應變項檢測其中介效果。

首先，參與團體的深度與廣度皆使用「請問您目前是不是以下組織／社團／團體的成員？如果是的話，請問您是不是積極地參與組織／社團／團體活動？」此一問題。

在深度的部分，本文將有積極參與任何一個社團的樣本視為「積極參與」，未參與任何一個社團者視為「無參與社團」，其餘則是「消極參與」。接著，我們以「無參與社團」為對照組，編出「積極參與社團」(1=積極參與、0=消極參與或未參與)與「消極參與社團」(1=消極參與、0=積極參與或未參與)兩個虛擬變項。

在廣度的部分，由於問卷中沒有「參與社團數」這項指標，而參與社團類型的數量也可

反映人際連帶的廣度，故本文將總參與社團類型數加總為連續變項「社團參與廣度」；因問卷中共有九類社團，數值範圍是0到9。

其次，在最常參與團體類型的部分，我們以「以上您所提到的組織／社團／團體當中，在過去一年內，請問您最常參加的是哪一個？」這個問題作為依據，以「參與其他團體或沒有參加」為對照組，將九個團體分別編成虛擬變項（1=最常參與該社團、0=其他）。

再者，變項「團體內階層化程度」是使用「請問在這個組織／社團當中，成員之間的關係最符合下列哪一種描述（上下關係）？」這個題目，將回答「上下的權力關係分得很清楚」、「有上位者和下位者之分，但大家輪流擔任」者編碼為1（高組織層級），其餘則編碼為0（低組織層級／無參加社團）。

變項「團體內同質性程度」則採用「承上題，請問在這個組織／社團／團體當中，成員在想法和作法方面彼此是不是類似？」此題，將回答「幾乎所有成員彼此相似」、「相同的比不同的多」者編碼為1（高同質性），其餘則編碼為0（低同質性／無參加社團）。

最後，「公民心性與能力」由四項中介變項組成：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政治知識、討論能力。「政治效能感」變項來自「像您這樣的人對政府的作為是沒有影響力的」題項，「政治興趣」變項來自「您個人對政治方面有興趣」題項，「政治能力」變項來自「對您來說要了解政府與政治的運作實在太複雜了」，依題意反向編碼；不過由於台灣部分問卷無「無所謂同不同意」此一選項，故本文將其他三國選擇該選項者，以該國該題項平均數的方式替代，最終三者都成為數值1至6的連續變項，數字愈高表示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政治能力愈高。「討論能力」變項則是將「與那些社會地位跟您類似／高／低的人討論有多困難？」此三題項（Cronbach's alpha值=0.7667）取平均值而得，數值為1到4。

（三）控制變項

除了以上變項，本文也控制其他可能影響政治參與的變項：性別（1=男）、年齡、婚姻狀況（1=已婚）、教育程度（1=國小或以下、2=國初中、3=高中職、4=專科、5=大學或以上）、工作狀況（1=有全職工作）、都市化程度（1=獨立農家／農村地區、2=小城鎮、3=大都市旁的郊區、4=都市）。

第四章 結果與分析

由於依變項（政治活動）為二元類別變項（有沒有參與政治活動），我採用二元邏輯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中國、日本、南韓、臺灣的結果顯示於表三。

我將依序討論四個可能理論機制的效力。在每個部分中，我將按照表二的程序，結合邏輯迴歸結果與描述統計進行分析。最後，則會檢測公民心性與能力的中介效果。

表三 東亞四國社團參與與政治參與的邏輯迴歸

	中國	日本	南韓	台灣
性別 (1=男性)	0.515*	-0.0862	0.737**	0.842***
	(2.10)	(-0.40)	(2.59)	(3.42)
年齡	-0.00740	-0.00626	-0.0109	-0.00495
	(-0.85)	(-0.87)	(-1.02)	(-0.53)
教育程度	0.295**	0.0758	0.255*	0.0175
	(2.64)	(0.73)	(2.03)	(0.16)
全職工作	0.0271	-0.529*	-0.705*	-0.671**
	(0.10)	(-2.18)	(-2.47)	(-2.71)
都市化程度	-0.163	-0.125	-0.229	0.0476
	(-1.53)	(-1.00)	(-1.73)	(0.43)
婚姻狀況	0.333	0.382	-0.344	-0.210
	(1.05)	(1.57)	(-1.06)	(-0.79)
積極參與社團	1.247	0.441	0.954*	0.372
	(1.90)	(0.70)	(2.55)	(0.57)
消極參與社團	0.674	0.252	0	-0.174
	(0.93)	(0.42)	(.)	(-0.31)
社團參與廣度	0.207*	0.310***	0.195**	0.452***
	(2.09)	(4.37)	(2.84)	(3.76)
團體內階層化程度	0.262	-0.268	0.880**	-0.329
	(0.74)	(-1.13)	(3.14)	(-0.86)
團體內同質性程度	0.244	0.0844	0.0799	0.186
	(0.71)	(0.30)	(0.28)	(0.36)
政治團體	-0.795	3.158***	2.746*	1.818
	(-1.52)	(4.22)	(2.17)	(1.72)
社區（村里）管理委員會	-0.295	0.534	0.420	-0.00358
	(-0.49)	(1.12)	(0.53)	(-0.00)
社會服務團體（志工 / 非營利組織）	-1.554	0.851	-0.421	0.503
	(-1.39)	(1.40)	(-0.48)	(0.60)
公民運動 / 消費者合作團體	-0.657	0.768	2.082*	0
	(-0.57)	(0.89)	(2.27)	(.)
宗教團體	0	1.851***	0.426	0.0191
	(.)	(3.53)	(0.61)	(0.02)

校友會	-1.725*	0.734	0.521	0.198
	(-2.01)	(1.47)	(0.76)	(0.19)
康樂性社團 (嗜好、運動)	-1.067	0.690	0.126	-0.288
	(-1.54)	(1.54)	(0.18)	(-0.36)
工會	-1.306*	1.835**	1.398	0.269
	(-2.03)	(3.23)	(1.37)	(0.27)
職業 / 專業協會 / 工商會	0	1.439*	0	0.970
	(.)	(2.48)	(.)	(1.13)
截距	-5.134***	-4.337***	-4.328***	-3.665***
	(-8.64)	(-5.62)	(-4.10)	(-5.26)
樣本數	5603	2161	1049	2038
Pseudo R ²	0.085	0.129	0.142	0.104
Log likelihood	-395.2	-425.9	-225.0	-322.0

註：表內數字為邏輯迴歸係數，括弧內數字為t值；另部分變項因樣本過低無變異（皆無參與政治活動），因此統計值產生缺漏。
* p<0.05, ** p<0.01, *** p<0.001

（一）社會化機制論

社會化機制論的主要測量變項是「參與社團的積極程度」。表三迴歸模型顯示，積極參與社團者只有在南韓，相對於未參與社團者對政治參與更有幫助；消極參與相對於未參與社團的效應，則在四國皆不顯著。因此日本結社與政治參與的落差無法由此理論解釋。

那麼南韓的社團成員是否比較消極參與呢？表四描述統計顯示，在有參與社團的人民中，南韓的積極參與比率高達69.3%，且是東亞四國中最高。既然在南韓，積極參與社團有助政治參與，且實際上積極參與的社團成員也很多，理論上應該不會看到社團參與率與政治參與率的巨大落差。因此，社會化機制論的解釋並未得到統計結果支持。

表四 東亞四國有參與社團者的積極程度（人，括號內為百分比）

	中國	日本	南韓	台灣
積極參與	926 (67.99%)	970 (51.35%)	736 (69.3%)	368 (47.12%)
消極參與	436 (32.01%)	919 (48.65%)	326 (30.7%)	413 (52.88%)

（二）動員論

動員論的主要測量變項是「參與社團類型數」。表三迴歸模型顯示，參與社團廣度的效應，在四國都呈現顯著。既然「動員論」在日、韓都是重要的政治參與機制，會不會是因為

兩國的社團成員接觸的社團類型太少，以至於無法發揮這個機制的作用呢？

表五描述統計顯示，在有參與社團的人民中，日本、南韓人分別平均參與2.36個及2.49個社團。單就這兩個數字來看，可能無法直接判斷日、韓社團成員的參與廣度究竟是高是低；不過若與中國、台灣比較，就可發現日、韓參與社團類型數顯著較多（F value=1198.04, p=0.000）。如果社團參與廣度有助政治參與，而日、韓社團成員也普遍參與兩個以上的社團，理論上應該不會看到社團參與率與政治參與率的巨大落差。因此動員論的解釋效力也相當有限。

表五 東亞四國有參與社團者的參與廣度

	中國	日本	南韓	台灣	F值
平均參與社團數 (個)	1.84	2.36	2.49	1.47	1198.04 (p= 0.000)
標準差	1.29	1.32	1.66	0.89	

(三) 公民社會形構論

這部分的推論比較複雜。首先，該理論的首要工作是要先界定哪些團體具有政治內涵。然而不同於許多既往研究直接給定「哪些社團類型有政治性」，或純以因素分析歸納出「情感性社團」與「工具性社團」（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2010），本文希望能考量東亞四國不同的公民社會形構，以統計分析來判斷東亞四國有政治內涵的團體類型。

不過要怎麼做？東亞社會調查詢問受訪者「最常參與的團體類型」，我認為這個指標有助於我們釐清哪些團體就其本身就有高度政治性。相比於「有參與的團體類型」，這個變項是有排除性的變項，因此可以針對各種團體做出虛擬變項，在模型中產生互相控制的效果；此外，社團廣度、深度、階層化程度、同質性程度也可以一併予以控制。如此，就排除了其他團體類型與其他理論機制對政治參與的影響，而能判斷團體類型本身的政治性高低。

據此，表三迴歸模型顯示：在中國，不存在對政治參與有正向幫助的社團類型，反而校友會、工會兩類團體（相對於未參與社團）對政治參與有負面效應；在日本，政治團體、宗教團體、工會、職業／專業協會／工商會都對政治參與有正向效果；在南韓，則是政治團體與公民運動／消費者合作團體；在台灣，所有團體都對政治參與無正向或負向顯著效果。

這就表示，只有在日本、南韓，看得出有高度政治性的社會團體類型；在中國、台灣，社團類型本身的政治性皆不顯著，反而中國有些團體有「反政治」的傾向。接著我們就可進一步來看，各國人民普遍參與的社團，究竟其政治性有多高。

表六基本上驗證了「公民社會形構論」的第一種假設。我以紅色欄位代表在該國對政治參與有反面效果的社團類型，以綠色欄位代表有正向效果的社團類型。從表中可以明顯發現，在日本與韓國，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社團，也正是那些人民參與率最低的團體類型。因此可以說，日、韓的「公民社會社團組成」仍保存著一定的政治性，但人民卻呈現整體參與率高、但多參與低政治性團體的「去政治化」傾向。這就解釋了社團參與率與政治參與率的落差。

相反地，在中國與台灣，兩國則是在「公民社會社團組成」的層次就已經「去政治化」；而中國部分社團的反面效果，或許也可部分解釋中國政治參與率是四國最低。

表六 東亞四國人民的社團參與類型

	中國	日本	南韓	台灣
政治團體	8.12%	4.47%	5.52%	1.69%
社區（村里）管理委員會	4.58%	60.72%	26.43%	4.27%
社會服務團體 （志工 / 非營利組織）	3.53%	7.63%	16.48%	7.32%
公民運動 / 消費者合作團體	1.74%	15.98%	6.66%	0.84%
宗教團體	2.70%	10.30%	29.23%	12.10%
校友會	6.41%	44.80%	47.78%	3.94%
康樂性社團（嗜好、運動）	4.84%	30.92%	38.75%	11.20%
工會	8.75%	10.88%	6.95%	5.53%
職業 / 專業協會 / 工商會	2.59%	8.77%	11.89%	6.90%

（四）東亞價值論

最後，團體內階層化程度與同質性，是否也能解釋東亞四國社團參與對政治參與的差異影響？表三迴歸模型顯示，在階層化程度方面，四國皆沒有出現負向效果，南韓的社團參與階層化程度則與政治參與則有顯著正向關聯；而四國同質化程度與政治參與都無顯著關係。因此，接著可以檢視在南韓，該理論機制的第二種假設——社團階層化程度低，因此無法發揮階層化對政治參與的正向效果——是否成立。

從描述統計（表七）來看，可發現南韓有16.69%的人，最常參與的社團呈現高階層化的傾向。儘管這個比例已比中國、台灣都高出兩倍以上，但此比例本身確實並不算高。因此，可以說「東亞價值論」在南韓與階層化程度的部分得到初步的支持；但若要完整解釋日、韓社團參與與政治參與的落差，該理論的解釋力仍然有限。

表七 東亞四國社團階層化程度與同質化程度

	中國	日本	南韓	台灣	χ^2	p value
高階層化比例	7.55%	18.34%	16.69%	6.94%	286.09	0.000
高同質性比例	14.57%	48.46%	55.52%	26.00%	1.5e+03	0.000

（五）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應

表八是表三加入四個代表「公民心性與能力」的中介變項後的模型。我將顯著度發生改變的欄位以顏色標記：綠色表示原本顯著變為不顯著，即「公民心性與能力」變項發生中介效果；紅色則為原本不顯著變為顯著的變化。以下將簡單分析表八的結果。

首先，「公民心性與能力」四個變項中，代表「心性」的指標（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

比起「能力」的指標（政治能力、討論能力）更重要，政治興趣更對四國皆有正向效果。

其次，在本文所關心的四大理論機制中，可以發現「公民心性」對「動員論」的中介效果最為明顯：中國、南韓原本廣度的顯著效果都被解釋掉了，而台灣部分的顯著度也有明顯下降（t值從3.76下降為2.07），只有日本的情況較不明顯。「公民心性」對「社會化機制」論的中介效果則未出現，反而是中國的情況（從不顯著變為正向顯著）顯示了，相反的因果推論可能比較能夠成立：具有高度政治興趣的人，比較可能積極參與社團，從而也更可能參與政治活動。至於「東亞價值論」，則基本上與公民心性與能力無關。

而最能回應本文核心問題的「公民社會形構論」，其被公民心性與能力中介的情況也有限。南韓的政治團體、日本的職業／專業協會／工商會，可以說是有助於促進參與者的政治興趣與政治效能感，其餘的團體則無法確定。這顯示團體能不能培養公民的心性與能力，也是視團體類型而定；換句話說，特定的社團類型之所以能影響政治參與，不見得是透過個人心性的培養，而可能是這些團體在該國的歷史脈絡下，被賦予了政治參與的重要角色。

表八 東亞四國社團參與與政治參與的邏輯迴歸（加入公民心性與能力）

	中國	日本	南韓	台灣
性別 (1=男性)	0.378	-0.187	0.630*	0.773**
	(1.51)	(-0.83)	(2.15)	(2.79)
年齡	-0.00878	-0.0107	-0.0150	-0.00768
	(-1.00)	(-1.38)	(-1.34)	(-0.70)
教育程度	0.245*	-0.0270	0.122	-0.0630
	(2.16)	(-0.24)	(0.92)	(-0.52)
全職工作	0.0789	-0.521*	-0.725*	-0.824**
	(0.28)	(-2.08)	(-2.48)	(-3.09)
都市化程度	-0.121	-0.111	-0.343*	0.0849
	(-1.14)	(-0.87)	(-2.48)	(0.71)
婚姻狀況	0.339	0.284	-0.355	-0.195
	(1.05)	(1.14)	(-1.03)	(-0.63)
積極參與社團	1.496*	0.716	1.012**	0.406
	(2.29)	(1.03)	(2.62)	(0.53)
消極參與社團	1.000	0.652	0	-0.105
	(1.37)	(0.98)	(.)	(-0.16)
社團參與廣度	0.165	0.265***	0.140	0.283*
	(1.67)	(3.54)	(1.94)	(2.07)
團體內階層化程度	0.192	-0.183	0.763**	-0.494
	(0.54)	(-0.75)	(2.62)	(-1.19)
團體內同質性程度	0.258	0.0865	0.0473	-0.131
	(0.74)	(0.30)	(0.16)	(-0.24)

政治團體	-1.182*	2.879***	1.706	1.153
	(-2.21)	(3.63)	(1.31)	(0.97)
社區（村里）管理委員會	-0.588	0.456	0.341	0.742
	(-0.96)	(0.95)	(0.42)	(0.71)
社會服務團體（志工 / 非營利組織）	-1.794	0.730	-0.591	1.063
	(-1.60)	(1.19)	(-0.64)	(1.15)
公民運動 / 消費者合作團體	-1.018	0.722	2.067*	0
	(-0.87)	(0.84)	(2.17)	(.)
宗教團體	0	1.678**	0.490	0.360
	(.)	(3.10)	(0.69)	(0.39)
校友會	-1.995*	0.584	0.523	0.255
	(-2.31)	(1.13)	(0.75)	(0.22)
康樂性社團（嗜好、運動）	-1.267	0.704	0.227	0.0252
	(-1.80)	(1.56)	(0.32)	(0.03)
工會	-1.464*	1.690**	1.630	1.182
	(-2.25)	(2.86)	(1.57)	(1.10)
職業 / 專業協會 / 工商會	0	1.124	0	1.578
	(.)	(1.88)	(.)	(1.67)
政治效能感	0.112	0.299**	0.174	0.0720
	(1.15)	(2.98)	(1.41)	(0.85)
政治能力	0.0826	0.0162	0.137	-0.108
	(0.80)	(0.15)	(1.08)	(-1.14)
政治興趣	0.332***	0.346**	0.481***	0.534***
	(3.61)	(2.87)	(4.17)	(5.96)
討論能力	-0.261	0.191	-0.435	0.363
	(-1.49)	(1.10)	(-1.82)	(1.86)
截距	-5.832***	-6.812***	-4.672***	-5.618***
	(-7.04)	(-6.78)	(-3.72)	(-5.63)
樣本數	5441	2107	1049	1738
Pseudo R ²	0.108	0.162	0.196	0.178
Log likelihood	-383.3	-399.7	-210.9	-264.3

註：表內數字為邏輯迴歸係數，括弧內數字為t值；另部分變項因樣本過低無變異（皆無參與政治活動），因此統計值產生缺漏。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為什麼在日本和韓國，超過一半的人都參與社團，政治參與率卻還是很低？本文發現，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兩國的社團成員傾向參與政治意涵較低的社團，反映了「去政治化」的社團參與傾向。這種「公民社會形構論」的觀點連帶也使我們發現，中國與台灣的「公民社會社團組成」本身就已經「去政治化」，不存在與政治參與關係特別緊密的團體類型。

這樣的發現，對理解社團參與的重要性有何啟發？本文無法透過量化模型提出整體性的分析，但我認為南韓經驗提供的啟示，可以當作後續比較、分析的起點。

首先，在「人民參與社團傾向」上，托克維爾（2013）指出，專制統治「往往使人們彼此相似，卻對彼此的命運互不關心」（頁84）。統一的法律、教育、意識形態，使每個人變得極為相像；然而，在政府對社會團體的監控與打壓之下，人民不再認為社會團體的行動可能為社會生活帶來改變，「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頁71），人們也更加分割成一個個只顧及自身利益的小團體。

因此，南韓人參與團體的去政治化傾向，可能反映了南韓人民在長期威權體制的影響下，產生了「無道德家庭主義」（amoral familism）（Kim Dongno, 1990）的文化心態，較難形成積極為公共利益行動的社團參與傾向，也呼應了托克維爾所說的，在威權體制長期影響之下，人民相似又分離的「集體個人主義」。

其次，在「公民社會社團組成」上，怎麼解釋南韓還是有部分團體類型有助於政治參與？有別於從個人心性培養的角度，我認為可從南韓民主化的歷史脈絡來提供可能的答案。

南韓的全斗煥在1980年光州事件後打壓各種社會團體，但1984年以後的自由化措施促成了「公民社會的復興」，公民運動團體與工會的反對運動最終在1987年促成民主化，顯見社會團體在民主轉型中的關鍵角色（Kim, 2007）。然而，民主轉型成功之後，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領導的市民運動（citizen movement），與農工階級主導的「民眾運動」

（minjung movement）分裂，後者由於長期被國家統合主義影響，加上財閥政治的興起，政治影響力漸趨式微（Choi, 2010）。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解釋：參與公民運動團體之所以對政治參與有正向效果，是因為在民主化歷程中培養出了高度的政治性格；而同樣在民主化過程中扮演要角的工會之所以沒有影響，則是因為其在民主轉型之後勢力的削弱。這樣的歷史解釋，也就能說明為何在南韓，公民運動團體對政治參與的效果，無法被「個人心性」的效應所解釋。

那麼，同樣經歷長年威權統治的臺灣，為什麼沒有呈現類似的圖像？與南韓的情況不同，台灣的情況是所有團體類型政治性都不明顯，且人民參與社團的比例很低。

對此我目前也無法從台灣既有的文獻中，給出肯定的答案。但可以發現的是，這與李丁讚（2010）所描述的「社會力政治化」是有所違背的。如果民主化過程中，由於族群民主化的動力，社團以打倒威權政體為目標，因而培養出了高度的政治性格，那麼我們就不會看到台灣如此「去政治化」的公民社會社團組成。相反地，1990年代以後社團治理化、企業化的趨勢，可能比較能夠解釋今日台灣公民社會的社團組成性質。

總而言之，本文強調公民社會的歷史形構。各國相異的歷史發展，使得不同社會中，具有政治意涵的團體類型不同，也影響究竟是否存在本身就有高度政治性的團體類型，以及人民普遍的參與傾向。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下，我們才能來檢視各國社團參與及政治參與的關聯，也比較能夠解釋社會資本論在各國適用性的落差。

本文當然也有其限制。由於僅使用單一來源、單一年份的樣本，本文結論的適用性，可能得要受到限縮。未來，如有機會使用跨年份、跨來源、以及更多國的樣本進行比較，將更能確認本文論點的適用範圍，甚至能進一步發展出公民社會形構的類型學劃分，並比較不同類型的公民社會形構中，社會化機制論、動員論乃至文化價值解釋的適用程度差異，進而提出更具整合性的理論解釋框架。

參考文獻

- 托克維爾 (2013)。舊制度與大革命 (馮棠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李丁讚 (2010)。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收於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主編，**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頁313-356。台北：群學。
- 林國明 (2016a)。審議造就積極公民？公民審議、社會資本與政治參與。**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8(2)，133-177。
- 林國明 (2016b)。誰來審議？台灣民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台灣社會學**，31，43-97。
- 湯晏甄 (2015)。東亞民眾的制度不信任感及其政治回應。**臺灣民主季刊**，12(2)：39-85
- 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 (2010)。解嚴後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時期與世代的效應與意涵。**臺灣社會學刊**，44，55-105。doi:10.6786/TJS.201006.0055
- 熊瑞梅 (2014)。社會資本與信任：東亞社會資本調查的反思。**臺灣社會學刊**，54，1-30。
- Choi, Jang Jip (2010). The Democratic State Engulfing Civil Society: The Ironies Of Korean Democracy. *Korean Studies*, 34, pp.1-24.
- Ekman, J., & Amnå, E. (201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Towards a new typology. *Human affairs*, 22(3), 283-300.
- Ikeda, Ken'ichi and Richey, Sean E. (2005). Japanese Network Capital: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s on Japane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27(3), pp. 239-260.
- Ikeda, K. I., & Takemoto, K. (2016). Examining Power in Hierarchical Social Networks in East Asia. In Steel, G. (ed.), *Power in Contemporary Japan*, pp. 143-166.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 Jones-Correa, M. A., & Leal, D. L. (2001).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oes religion matter?.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4(4), 751-770.
- Kim, S. (2007).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Korea. In C.K. Armstrong (Ed.), *Korean society, civil society,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2nd ed.), pp. 53-71. London: Routledge. Retrieved from <http://campus.unibo.it/251571/1/KIM.Civil%20Society%20and%20Democratization%20ocopia.pdf>, 2018/1/1.
- Kim, Dongno(1990).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ism in Modern Korean Society: From Cooperation to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5(4), pp.409-425.
- Norris, P. (2002). *Democratic phoenix: Reinventing political activ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k, C. M., & Shin, D. C. (2005).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1), 63-85.
- Pekkanen, R. (2006). *Japan's Dual Civil Society: Members Without Advoc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Seligson, A. L. (1999). Civic association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A test of the Putnam the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2(3), 342–362.
- Sobel, R. (1993). From occupational involvement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Political Behavior*, 15(4), 339-353.
- Sobieraj, S., & White, D. (2004). Taxing political life: Reevalu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the stat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5(4), 739–764.
- Verba, S. & Almond, G. A. (1989) 。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徐湘林譯） 。北京：華夏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63）